

欢庆六一

# 别把儿童节搞成“劳动节”

□朱慧松(湖北)

据5月31日《光明日报》报道,从5月上旬开始,山东省淄博市某实验小学二年级的嘉琪就进入了紧张的节目排练中。她跟小伙伴们一起,要先经过一轮验收,再与其他班级比赛,胜出者才有机会参加学校的会演,而在学校会演中表现突出的,还要到区里进行评选。

嘉琪班级的节目是腰鼓表演,每天的训练渐渐让她觉得吃不消了:“胳膊酸疼酸疼的,一回来就累得想睡觉。”家长也有了意见:“孩子除了正常上课还要额外排练,全家都得围着她转,作息安排都打乱了。”本该属于孩子最快乐的节日,结果变成一种负担。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笔者邻居李姐的女儿小娟在上小学,以前每天晚上孩子都在家做作业。可最近一段时间吃了晚饭后,李姐就带小娟出去了,很晚才回来。我有些纳闷,问李姐是不是给孩子在外报了培训班。李姐说晚上带孩子到学校去了,我更奇怪了,莫非小学生也上夜自习呀!李姐叹了口气,告诉我了事情原委。

原来儿童节里,学校要举办一场大型文艺演出,据说有领导来观看,学校高度重视,从每个班上选出几个有文艺天赋的孩子进行排练,小娟也被选中了。孩子开始还很高兴,可后来

就变得愁眉苦脸。每天晚上都要到学校排练,双休日也得去,老师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没做好就遭训斥,小娟没少挨老师批评。而晚上回来后已经很晚了,还要背台词、赶作业,往往到凌晨才能睡觉。孩子累得够呛,向妈妈哭诉,这哪是儿童节,简直是“劳动节”!她再也不想过儿童节了。李姐听了心里很难受,却又无可奈何。

儿童节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这一天他们会得到美好的祝福、精致的礼物,本应快快乐乐、翘首以待。可事实上,不少孩子对儿童节是又爱又恨甚至至是“恨”大于“爱”。原因何在?就因为一些成年人的功利心让儿童节少了本应有的

童趣和轻松,多了不应有的严肃和沉重。

很多学校庆祝儿童节的做法便是组织孩子们排练节目,准备大型演出。孩子时常常得提前“备战”,忙得不可开交,累得气喘吁吁。儿童节当天,各级领导坐在遮阳伞下看表演,而孩子则顶着烈日又蹦又跳,因此累趴下、晒中暑的事情没少发生。这究竟是孩子过节还是领导过节呀?是否又问过孩子们,这样的过节方式他们喜欢吗?

儿童节里的主人应是孩子,如何过节应该由他们说了算,岂可由成年人一手包办。老师和家长不妨多倾听一下孩子的想法,在最大程度满足他们的心愿。

倾听民声

## 我国禁烟效果为什么差

□苏胡(河南)

原以为由于多年或大或小或多少的宣传,吸烟的危害早已尽人皆知,可看了眼前报道才明白,这不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近日,《新民晚报》一篇报道说,时至今日,我们的国民对吸烟的危害认识仍相当不足,又因认识不足,在公共场所实行禁烟也就很难。其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当你看了报道中的有些数字后,对我国为何仍是一个烟草大国,公共场所禁烟效果为什么那么差,也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在吸烟可能引发中风、心脏病的知晓率上,我国排在20个被调查国家的最后一名。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即便心脏科医生,也有近1/3仍在吸烟。

如果说心脏科医生吸烟还只是“个人问题”,公共场所难以禁烟就是对公众的危害了。今年卫生部发布通告称,在暗访的全国3340个医疗卫生机构中,综合评分为70.6分,仅有天津、江苏、陕西和新疆4个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得分为满分。也就是说,即使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烟草的危害也不当回事。

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是这种情形,而生产知识的高校同样不容乐观。2011年9月,中国控烟协会发布的暗访报告显示,在覆盖31个省份的800所被调查高校中,仅有16所得分超过60分,合格率2%。显然,一些原本被称作高素质的国民对给人带来严重危害的烟草同样是偏爱有加。

一个社会,有了这两个原本最懂得吸烟危害的人群尚且不把禁烟放在眼中,你叫这两个人群之外的普通国民又如何能认识并自觉加入到禁烟大军中来呢?

然而,这还不算完。据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我国烟草税率只有36%,在世界上排名倒数第三,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理想烟草税收应占其零售价格的67%~80%相距甚远。这说明,相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我国其实是鼓励烟草生产商的。一包烟,即使交了近70%的税,仍可获得一定的利润;而像我国这样,只收世卫组织建议烟草税收的一半,让生产商获得的可能是暴利,这不是在鼓励又是什么?

或许中国烟草生产商们也正是看到自己生存在这样一个有利而又“肥沃”的土壤环境中,烟盒上的文字、图形也就不按世卫组织公约要求制作,有意无意间让国民忽略对烟草危害的认识。

由以上情形来看,我国禁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什么时候烟草生产商以及卫生部门乃至国家都真正认识到了禁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由此引导广大国民提高认识,禁烟效果才能“凸显”。

读者来信

据《中国青年报》5月29日报道,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顾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全国31个省(区、市)1056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5.6%的受访者坦言如今“哭穷帖”较多,86.3%的受访者感觉“哭穷帖”泛滥会产生一系列社会负面效应,严重误导阅历不深的年轻人。

## 请宽容满天飞的“哭穷帖”

□李辉(广西)



美堂图

熟悉网络的人都知道,当前“哭穷帖”满天飞是事实,一些“哭穷帖”充斥着撒娇、矫情的成分也是事实。然而,调查结果称“86.3%的受访者感觉‘哭穷帖’泛滥会产生一系列社会负面效应,严重误导阅历不深的年轻人”,还是让人很意外——顺着这样的说法,接下来的“41.5%的人指出,网站、论坛等管理人员不该给假惺惺的‘哭穷帖’提供生存之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哭穷帖”果真有这么大的危害吗?

在许多被调查者看来,“哭穷帖”泛滥会造成巨大的“负能量”。其实,这个社会远没有那么脆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哭穷帖”或许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可一个健康的本应该产生的“正面效应”,应该很轻易就能将其克服掉才对呀。

事实上,“哭穷”不该禁止,“哭穷”也无法禁

止。试想,那些反感他人“哭穷”甚至希望封杀他人“哭穷”的受访者,难道他们就没有抱怨过油价高、菜价贵?难道他们就没有叹息过房价涨、看病难?这也是“哭穷”,区别只在于程度不同,以及发帖还是动嘴而已。至于一些极端的人发帖感叹自己月入数万过的却是“穷人的生活”,这就像旧时的大户人家也向穷亲戚说“大有大的难处”,亦真亦假,对此无需发笑也无需悲戚,没必要视为异端,更没必要感到听不得,乃至要求别人闭嘴不说。

其实,我们当前的绝大部分人,还真不富。“民生多艰”的日子,并没有离所有人而去,因此,面对网上诸多的“哭穷帖”,宁可信许多人是真穷,该期盼的是职能部门多为人们谋富,这比站在某个制高点上,视“哭穷帖”为洪水猛兽,恐怕更能体现一个正常人、正常社会的道德良心。

公民监督

## 如何让财政透明度及格

□徐冰(北京)

析也很实在:离不开中央的“上行下效”。项目负责人杨丹芳说的则更到位,信息公开与否,在项目组看来“与中央的表态以及各省领导的执政风格密切相关”。

我认为杨丹芳已经完全概括了当前信息公开的最主要特点,尽管不能否认“倒逼”的力量,但的确无法过于乐观。结合目前中国的行政改革进程,“由上而下”推进依然是信息公开的主流路径。

从全局的方面,2009年温家宝总理提出用3年的时间公开全部中央部门预算,随后中央部门的“三公”预算公开呈现加速态势。最新的消息则是,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表示,今年,中央本级和各部门的“三公”经费、行政经费将一并公开。按照程序,这些内容将在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进行公布。而从局部的个案来看,上财课题组提供的一个事例也足以说明问题:“第一年排名靠后的新疆,就在第二年换了领导后,这两年排名都很靠前。”

从以上信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政透明

城市话题

## 广州城管该反思什么

□马龙生(北京)

5月30日下午6时许,距离恒大与东京FC比赛开始还有不到两小时,天河体育中心广场外已经聚集了很多球迷。不少商贩也借此良机在球场外摆摊卖国旗和恒大球衣。但城管部门却严令场外不许贩卖国旗,并坚持要没收所有国旗。这让现场球迷相当不理解,最后演变成球迷围堵、追打城管的局面。

(5月31日《新快报》)

执法者被路见不平的球迷追得满街跑,这样的尴尬着实让城管部门“掉了价”。可是细想一下,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又让人觉得广州城管部门的做法确实有些欠妥,做出一些反省还是必要的。

有网友说,比城管查抄行为更可恨的,是做出这一规定的人。这话确实有一定道理,球场“禁旗令”本身,有着太多不可思议。是从球场治安角度考虑的吗?可是旗帜是用布或纸做成的,没有凶器功能;是怕球迷看完球后把国旗随意丢弃,有辱国旗尊严吗?可是“任何旗帜都不能带入场内”又做何解释?任何规定,总要有一定的依据,可是这条规定,却实在让人看不到依据在哪儿。你的规定不能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必然会带来普遍的抵触情绪,执法效果怎么会好?

相对于规定本身的难以理解,现场执法者“没收国旗时动作比较粗鲁”,无疑就是引爆冲突的导火索了。如果城管人员能早些上岗,在球迷还没有大量聚集时,就把卖国旗的小贩搞定,或者在执法时能文明一些,恐怕也不会引发球迷的路见不平。

对于广州恒大来说,5月30日是一个有望改变中国足球在洲际联赛历史的一刻,球迷的心情可想而知,为球队助威的旗帜,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东西。然而,广州城管的“禁旗令”,本来就给球迷的热情大大泼了冷水,又因执法态度的粗鲁,为球迷提供了发泄不满的借口。

可见,城管尽管有着太多的不被理解,而且许多指责也未必是公平、理性的,但是这也并不能说明,城管本身的工作,就没有值得反思、改进之处。

度或者信息公开要想进一步推进下去,必须要保证“上行下效”的机制得以继续存在;无论是全局还是地方,“一把手”的作用极为重要而且不可替代。因此,信息公开成败的关键,是如何让“一把手”的行政风格尽可能地符合信息公开的要求。

无需讳言,依靠“上行下效”以及“一把手”来推进信息公开,显然存在致命的变数。换一个领导排名就靠后了,再换一个排名很有可能就靠后了。所以,信息要想进一步公开,关键不是换不换领导,而是换怎样的领导。自然,从行政风格的潮流来看,我们希望换上的领导能够顺应行政文明的大潮,让公开透明成为我国的行政主色调。

从这个角度,虽然目前不宜盲目抬高“倒逼”的作用,但终究无法忽视“倒逼”的巨大潜能。本文一开始就提醒要记住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执著努力的本身就是“倒逼”力量的一部分。尽管这种“倒逼”力量尚且微弱,而且还要仰赖“一把手”的松紧收放,但只要假以时日且不懈努力,量变终会成为质变。